

消费者、投资者 和公民

货币困扰下：手段与目的的
经济学意识

袁 东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消费者、投资者 和公民

——货币困扰下：手段与目的的
经济学意识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费者、投资者和公民——货币困扰下：手段与目的的经济学意识 / 袁东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141 - 0067 - 9

I. ①消… II. ①袁… III. ①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2861 号

责任编辑：卢元孝

责任校对：王凡娥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潘泽新

消费者、投资者和公民

——货币困扰下：手段与目的的经济学意识

袁 东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11. 625 印张 290000 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0067 - 9 定价：22.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在于其独有的形体特征，更在于其社会网络中的规范性存在。从经济社会角度讲，我们每个人，首先始终是一个消费者，当然也是某一个阶段的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我们还可能是投资者。在现代政治文明层面上，每个人理应是公民。消费者和投资者针对的是市场，公民针对的是更广泛的公共领域。这恐怕是人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所在。

无论是作为动物本能的人，还是社会存在的人，都有着各自基本和非基本的需要。但在当今货币经济社会，需要者并非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是具备一定消费能力的人。没有消费能力，有些需要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而消费能力，亦即有效需求，是指在一定价格水平上愿意且能够购买的商品和服务量。这一能力首先体现在所拥有的货币量上。况且，只有货币出现后，才有了价格的标示和更理性的收益成本计算。

消费能力的提高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提高。
收入的提高，不仅仅依赖于劳动力商品的市

货币困扰下：手段与目的的经济学意识



场交换，还取决于投资能力。而投资能力的培育，首先要有可供投资的资财和市场。只有投资者和消费者的结合，才可能有着较高的消费能力。然而，如果没有公民权益的普遍认可和保护，无论是消费能力还是投资能力，都不可能得到持续性增强。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及其文明的持续进步，要求个体在消费者、投资者和公民身份上的高度统一。这一道理并不高深，而是常识。相信并遵循常识，始终是明智而聪慧的。

其实，就作为人类主动设计和组织的制度社会看，使个体成为消费者和投资者容易，而真正建立一个公民化社会，可能需要更大的智慧。为此，如何不断防止行政垄断力量不恰当延伸，并与此同时建设和扩展公共空间，是关键。当然，针对所有这些制度化框架，共同体中那些少数精英的作用至关重要。相比外在物质性客观世界，现在看来，关键群体的意识和行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总是主导性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从防患于未然或防祸的角度讲，最应该防的还是人祸。

现代的每个人都离不开货币，称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为货币经济社会，恰如其分。作为市场交换内生的货币，在历史变迁中，演化成了国家强制性“法定货币”制度。所有现代经济金融现象，无论是方便和效率，还是麻烦与危机，无不体现在货币上，或由货币引发。“货币文化”，成为我们正经历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典型特征。但是，人类也正处于自我选择的货币的困扰中。

不管是在单一经济体内，还是国际间，人们都认为货币是可控的，也都努力试图去控制货币，以求实现人们想要的效果。中央银行制度，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和制度框架，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等等，都是上述企图的现实体现。



然而，恰恰是人类自我设计和创造的货币制度，成为不同于物理和化学现象的是，迄今为止并未体现出多大可控货币困扰下：手段与目的经济学意识

性。反而，情形似乎越来越不理想。金融危机一再发生，频率增大，破坏性也越来越大。金融救助不仅变得不可避免，而且成为制造不公平不合理的重大因素。现代货币的国家强制性，使得政府因素在市场领域中无处不在，越陷越深，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这并不是令人乐观的迹象。

当然，人们一直在探求摆脱这种货币困扰的途径。从经济学上看，货币原本具有的市场内生性，以及历史演变中的制度特性，使得有效的探求，只能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寻求出路。在这一方面，货币在“国家本位”和“市场本位”之间的某种结合，可能是富有启发的智慧性探讨。

说到底，货币毕竟是一种手段，既不是直接生产对象，更不是直接消费对象。然而，现实中，人们往往很容易将手段当成了目的。否则，就不会有“金钱拜物教”之说。

也许，经济学的重点并不在终极目的确定，及其价值的分析，而主要是基于一定目标，针对手段选择有效性的研究。但将手段与目的颠倒的问题，不仅在经济学研究上存在，更是普遍存在于经济实践中。诸如，金融经济危机和衰退期间，公共政策的选择与确定问题；农业、工业与金融业发展问题；国际之间重大事宜协调方面；对各类经济现象的解释等，都存在一个理清手段与目的的问题。

本书所探讨的，正是上述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的事宜。这也是过去近两年里，我所撰写的经济分析文章。有的作为专栏文章，已经公开发表。有的尚未发表。这些文章，不管是分析哪方面的现象，都是基于经济学意识，因而分析工具都是经济学概念和理论。

在此，我将这 67 篇文章，分别以“市场和社会：私人
性与公共性”、“货币和金融：市场性与国家性”、“中国和
货币困扰下：手段与目的的经济学意识



6
序 世界：特殊性与一般性”、“学说和现实：理性与感性”四个板块，来概括和界定，结集成本书。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卢元孝先生，正是他的一贯肯定、鼓励、帮助和支持，才使本书得以出版。我还要感谢上海证券报社的沈飞昊先生，这些文章的写作，很多是为了应付飞昊兄为我开设并把关的专栏所需。我更要感谢读者朋友们一如既往的鼓励、批评与支持。

以上，是为自序。

袁 东

2009年10月31日于北京西山

2010年9月24日于北京西山补记



目 录

市场和社会：私人性和公共性

说法	3
相信谁	8
消费者、投资者与公民	13
财富观定兴衰——兼议葡萄牙和西班牙兴衰的历史启示	18
行政垄断造就平庸	24
垄断之恶——兼议改革开放的实质	29
如何建设和扩展公共空间	34
最应该防的还是人祸	39
流动性之散论	44



富国的惊人失忆	50
历史和未来：理性认知——兼议赶超和领先的根本力量	54
该向发达国家学什么	
——兼议什么是当今发达国家赶超阶段时的真正经验	60
傲慢与偏见——兼议宽容和谦逊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的重要性	66
何时为中国队喝彩助威	
——世界杯足球赛有感：兼议民主监督机制建设的关键性	71
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	76

货币和金融：市场性与国家性

货币困扰	81
货币政策之难	86
类似的历史情形，不同的结果	92
谁来充当定海神针——兼议国际储备货币	99
国家控制和国债货币化	104
货币政策：相机抉择还是规则制	109
纸币本位时代：“超主权货币”行得通吗？	
——从欧元的困境说开去	113
中国会进入低利率时代吗？	118
事实变了，想法就得变——公共政策该关注股票市场了	122
从货币与会计制度看危机形成中的政府因素	
——兼议危机更多是政府因素使然	126



脆弱的金融	131
到底什么是银行业的最根本标准	136
哪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142
不可避免的金融救助	147
人民币区域化与债券市场	151
做空欧元	156
欧元：难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命运	161
欧元还会下跌吗？	166
抑制通胀切勿依赖人民币升值——兼议汇率与通胀的关系	170
金融资产交易与通胀——来自巴罗公式的框架分析	175
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货币危机——兼析现代金融危机的基本特征	180
货币危机是一种制度性危机	188
货币： 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兼议货币困扰的缓解探求	195

中国和世界：特殊性与一般性

恐惧未见得都不好	207
国家股东的特殊性与一般性——一种令人担忧的情形	212
不宜设计和征收物业税	217
进一步对内开放：下轮经济增长的关键	222
事权、财权、举债权——兼评中央政府代	
地方政府发债的政策	227



中国消费率将不断回升——兼议消费行业投资的良好前景	231
中国会面临“锈蚀带”问题吗？	
——兼议服务业发展的条件与路径	237
“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城市而非乡村	243
经济危机与贸易保护主义	248
求远更不舍近——简议中国“走出去”战略	252
社会的木桶观点：短板的决定意义——关注低收入群体	256
“民工荒”带来的深层思考	
——兼议农民工供给的稳定性问题	261
财税体制适时再改革	266
分配体制和结构改革：重点还是国有企业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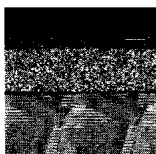
学说和现实：理性与感性

代价	279
功夫	284
定价权	289
手段与目的	295
遗忘和铭记	299
短期和长期	303
预测和计划	307
周期短期化：信息层面的一个解释	312



生产和消费哪个更重要——兼谈两种经济学理论传统	318
国家和经济增长——兼议财政、货币政策的行为同质性	323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会有市场	328
人性与政治之散论	332
雅俗之论——兼议经济的实质	337
莫衷一是的年代	343
意识的经济与社会意义——重读道格拉斯·诺斯有感	350
后记	355
后记之后记	357





说法

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误，都是一种陈述——说法，只不过有着是否符合事实之别。无论这事实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对其陈述得对与错，均是以其可知为前提。但这世界的可知性，只是相对而言的。还是那位哲学家波普最聪明。他认为，某种说法很难被证实，但可以被证伪，在没被证伪之前，就可以将其当作真理看待。面对无限的世界，这难道不是最明智的说法吗？

独立于人身之外的自然现象，并不受各种陈述的影响，因而人们可以将其当作纯粹的客观，置于自己的观察、分析研究之中。社会现象则无论如何都无法被研究者当作纯粹客观来分析，不管你是隐居深山的宗教大师，还是像独处“林中小屋”写作《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一样的世俗哲学家。因为，研究者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分子，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难以分离。所以，同样是研究存在哲学的萨特，干脆携手他那位志同道合者波伏娃，整天坐在人来人往的咖啡馆里思

货币困扰下：手段与目的的经济学意识



考和写作。

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是，凡是社会科学的陈述，不论是对还是错，都会对被研究对象——个体和社会行为——产生影响。越是主流的说法，越是影响广泛和深远。正因影响广泛和深远，才被称作主流，尽管这种说法也许压根儿就不符合事实，而属十足的谬误。就社会科学理论或思潮而言，主流者，未必是真理。但只要成为主流，就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力量，而不管这种力量的后果是否是灾难性的。正如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的总结：“主流社会思潮塑造着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且，业已建立的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

这就是为什么人言可畏的道理。号称“哲学天才”的维根斯坦则认为：人类生活的实质，其实是一个语言活动。萨特则直接将其一本童年自传体著作取名为《词语》^①。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那本传世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束语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②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古往今来，为什么那些统治者异常重视思想统一。中国封建王朝的集权专制者，专制的核心就是人们的思想，追求思想的“天下一统”，为此不惜“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搞“文字狱”，等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苏联红军攻入德国魏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占领并关闭了设在该城的尼采档案馆——由尼采的妹妹于1894年创建，并将这位写作《权力意志论》和主张“超人哲学”

① 萨特：《词语》，中译本，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②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0页。

的哲学家的表弟福斯特（尼采档案馆馆长）逮捕并判刑到西伯利亚劳改。

思想者，无非是一些有着严密逻辑体系并学术化了的说法而已。尽管思想可以成事也可以败事，但没有思想，断不会成大事，或者持续成事。对此，我非常欣赏一位没有专门学习过经济学做过经济工作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对晋商成败的分析。这位对当代中国“学者型散文”有着一定贡献的学者，关于促成历史上晋商成功的四大人格素质的总结：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并不亚于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的分析。特别是，在分析晋商最终趋于败落的内在原因时，他的如下结论更是突出了思想的重要性：

“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没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即便在商务上再成功也难于抵达人生的大安详。”^①

也正因如此，我非常赞同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2007年走上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坛马歇尔讲座时，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发展与转型成功的原因概括为“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②，其中的根本因素是思潮。他的这一概括，也印证了我这里有关主

^① 余秋雨：《抱愧山西》，载余秋雨著《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流者未必是真理，正确的未必是主流的说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占主流的社会思潮是，要想加快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应当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才是这些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均是劣势。但这一主流思潮却极大地左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执政方针。因而现实中，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不仅没能增加经济体的剩余，促成技术和产业升级，反而建起了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甚至经济和社会濒临崩溃。韩国、中国台湾与香港等经济体，由于逃脱了这一主流思潮的影响，从其比较优势出发，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对外开放弥补本土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需，待经济剩余积累到有力量有条件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时，才集中资源对资本品进行“进口替代”。从而造就了大量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技术和产业选择不断升级，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大大缩小了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同样，到20世纪80年代，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当时主流社会思潮是“资本主义胜利论”，集中体现为激进推进市场制度建立的“华盛顿共识”，主张转型应是一种短时间内“宏观先行”的“休克疗法”。但受这一主流思潮左右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却遭遇了长时间的深度衰退。现在看来并不成功，诚如林毅夫的说法：“只有休克，没有疗法。”倒是中国和越南，未能受这种主流思潮控制，选择了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双轨制、渐进式非主流转型路径，遵循比较优势战

略，先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引进外资，扩大进出口贸易，递次推动技术和产业升级，从货币困扰下：手段与目的的经济学意识